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网络言论的 理性审视、影响因素与引导策略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孟 达

(深圳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118)

摘 要:中国网民中的大学生人数众多。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的网络言论,可以感知言论背后蕴含的个人情绪、社会情感以及集体心理意向。基于1566份问卷调查和对11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发现:面对重大疫情,大学生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较高,整体情绪较为稳定;大学生的情绪状态、政治面貌、是否位于疫情严重地区以及是否为医学相关专业是影响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的主要因素;性别、民族、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产生的差异不显著。政府及教育部门要允许大学生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理性的个人情感,使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公共意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言论;网络舆情;社会治理;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2)03-0001-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近乎极限测试的方式检验了各国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在抗疫过程中,除了线下的抗疫表现,线上的防疫宣传及舆情引导效果同样反映了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各个阶段,我国专家学者在线上正面宣传引导,官方权威媒体以及医疗卫生领域的头部社交账号有理有据地进行解释和说明,逐步建立并完善线上线

联防联控体系,宣传引导疏解民众情绪,最大限度减少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使相关部门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线下的疫情防控行动。在后疫情时代,不仅要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网络管控以及网络谣言治理的经验和教训,还要分析网民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水平。只有深刻了解网民的心理活动以及网络行为动机,才能更好地进行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和政策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收稿日期:2022-03-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辅导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提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20JDSZ3054);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媒体语境下深圳青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SZ2022C023)

作者简介:孟达(1986—),男,广东深圳人,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舆情治理。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微信、网页、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是公众获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信息的主要途径^[1]。突发事件具有动态性和破坏性的特征^[2]。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部分网民出于对自身安全的关切,在网络夸大事件危害、散布谣言、盲目质疑政府。非理性的网络言论内容情绪化明显^[3],在短时间内易形成网络舆论“风暴”,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4]。国外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论的研究,正从以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向以实证研究和计量建模为主的定量研究转变,大多基于对 Twitter、Facebook 等西方的社交媒体平台舆情信息的研究。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以解释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为主,在宏观视角下分析网络舆情现象、特征以及引导机制^[5],缺乏量化分析的体系与框架,微观层面分析有待深入^[6]。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研究要关注微观意义上的舆论,不该忽视需要规制的对象^[7],应将网络舆论的重要行动者“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网民个人是否独立思考、运用自我智慧在网上发表言论^[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21年2月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40岁以下网民超过50%,学生网民占比为21.0%。中国网民的结构呈现学生多、年轻人多的特点^[9]。有观点认为,青年情感丰富,易冲动,对信息理解能力不足,对谣言分辨能力较差,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较低。网络言论理性程度指网民在网络上讨论相关话题、表达自身观点时的理性程度^[10],是判断公众是否有序进行网络参与的重要依据^[11]。大学生真的普遍媒介素养不高、容易在网络上发表激烈极端的言辞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容易在短时间内使公众

产生恐慌情绪,很多学者关注到情绪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情绪状态对其语言加工会产生重要影响^[12-13]。语言是建构情绪的重要力量,对情绪的研究优先点应放在对人的语言研究上。除了情绪因素被学者普遍关注外,群体压力与群体暗示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群体中的个体极易受到领袖召唤、集体恐慌或群体暴力的影响,而群体行为的发生也离不开领袖及其操演的仪式^[14]。已有研究证实了突发事件中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结构逆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5]。近年来,高校致力于将以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为主的学生骨干力量培育成关键的网络意见领袖。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学生党员及学生干部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究竟如何,是否起到了网络上“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需要验证。还有研究发现,意见领袖及政府部门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有可能导致“逆火效应”,表现为辟谣或说服可能会导致人们更加相信谣言或更加坚信原有观点^[16-17]。基于对这些现象的思考,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一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网络言论的理性程度如何?

二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受哪些因素影响?一方面,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如何,情绪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另一方面,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民族、所学专业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

三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对哪些网络信息源信赖程度较高,大学生较为信赖的网络意见领袖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调查时机的把握。已有研究大多选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后,调查对象情绪已趋于平稳,对事件认知较为全面的情况下通过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进行调研。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严重之时便对大学生的情绪状态以及网络言论理性程度进

行实证研究,重点聚焦疫情严重之时大学生的内心感受和言论理性程度。二是研究方法的运用。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网络论坛、新浪微博热搜、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及评论搜集到的网络文本进行编码研究,分析网络舆情类型、体系构成及动态演变。本研究除了采用量表测量大学生个体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还采用了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来获取大学生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三是研究视角的下沉。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的对象是“突发事件”,重点关注事件的发展过程、规律以及应对机制,较少关注事件中网络行为主体“人”。本研究从微观个体层面探究大学生网络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笔者依据国内外研究网络舆情普遍采用的文本分析法,通过观察大学生网民发表网络言论是否情绪化、是否过激来判断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通过对国内三所高校的三名教师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期间所抓取的各自微信朋友圈的内容进行统计,发现大学生转发疫情谣言的频数明显低于非大学生,但这并不能说明大学生网络言论就够理性,因为大学生在朋友圈发表疫情相关信息的频数也相对较低。在一些针对疫情的网络热点事件节点上,大学生转发深度报道及蕴含个人观点文章的次数高于非大学生,存在特定节点的刷屏现象。文本分析发现,大学生面对突发事件时会用较为谨慎的态度公开发表相关言论信息,但也不排除存在统计不完整的可能。

如所抓取的信息仅限于相对公共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封闭、私密平台上的信息无法抓取,一些大学生有可能在相对封闭且具有强连接关系的社群发表个人观点。对11名大学生的深度个人访谈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测。访谈发现,大学生对网络疫情信息的态度较为谨慎,在有关情况未经核实前,较少在公开平台转发与疫情有关的信息,认为发表谩骂或带有极端情绪的言论不利于疫情的防控。在重要节点转发文章表达个人意见是为了分享与公众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探讨和呼吁采取更好的办法应对危机事件。大学生虽然在网络公共空间较少讨论疫情,但是会在相对封闭且人数较少的亲人社群或者有强连接关系的朋友社群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护。文本分析法只能统计大学生的网络言论行为,考察言者理性,无法统计大学生对于网络言论的态度,忽视了观者理性;注重言语的外在形式理性,忽视了大学生言论的深层次情绪基因及隐喻内容的实质理性。网络上看似礼貌非激烈的言论不等同于文明、理性,语言表达形式上的理性不等于内容实质层面的理性^[19]。在社会化媒体中,积极主动表达自己意见与态度的并不是所有网民,网络上的舆论声音未必是网络民意的完整的、真正的体现^[20]。因此,需要通过科学设计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量表,对大学生进行从认知到行为、表象到实质的全面评估。

在用户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都遵循态度影响行为的研究范式,理性行为理论模型(TRA)^①、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PB)^②与社会认知理论模型(SCT)^③均反映了人的认知与态度的重要性。研

①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是由非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于1975年提出,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

②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由阿耶兹(Ajzen)于1985年提出,是由理性行为理论演变而来。计划行为理论在分析人的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时,除了考虑“态度”“主观规范”影响外,还考虑了“行为控制知觉”的影响。

③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是由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提出,它着眼于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在引发人的行为中的作用,重视人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究人的网络行为不仅要通过文本分析聚焦可见的网络言论,还要关注隐藏在言论背后的认知与态度。由此,笔者在网民公共讨论理性量表^{①[21]}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个人深度访谈法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建构,然后采用专家咨询法邀请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

业各两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接下来在小范围内发放问卷进行样本试测,回收样本后使用 SPSS19.0 对试测样本进行可靠性分析和因子分析,通过信度与效度检验后,最终确立了评估指标体系及问卷对应题项,详见表 1。

表 1 网络言论理性程度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题项
认知 (X ₁)	网络信息甄别 (X ₁₁)	在转发相关信息时,我会在求证真实性后再转发(X ₁₁₁)
		在网络讨论中,我用可靠的事实和数据说话(X ₁₁₂)
	坚持独立思考 (X ₁₂)	如果有机会,我会给家人或朋友推荐辟谣平台以甄别网络信息(X ₁₁₃) * 如果多数网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比较统一,我往往和他们保持一致(X ₁₂₁) * 对于网络知名人物的发言及评论,我基本上是认同的(X ₁₂₂) * 看到在朋友圈中被大量转发的带有强烈个人观点的文章,我看完之后不管认同与否也会继续转发,让更多人看到(X ₁₂₃)
行为 (X ₂)	盲目质疑政府(X ₂₁)	对于政府出台的政策和所采取的行动,我很少提反对意见(X ₂₁₁)
	保持谨慎言论 (X ₂₂)	在事实未查明或者信息未证实之前,我不会轻易发表个人意见(X ₂₂₁) 在网络信息发布或者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事实的陈述既不会夸大也不会缩小(X ₂₂₂) 此次各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会辩证认识,冷静客观地表达个人观点,尽量避免掺杂个人极端的主观情绪(X ₂₂₃)

说明:标*的为反向计分题。

在问卷发放学校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几点:①兼顾不同地区的院校,样本院校既要覆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也要覆盖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②兼顾不同类型的院校,样本院校包括综合性院校、师范类院校、理工类院校以及医学类院校;③兼顾不同录取批次的院校,样本院校包含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以及高职院校;④选取的高校辅导员或班主任愿意在疫情协助发放问卷。最终选择了深圳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医学院、新余学院、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七所高校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大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在开展定量研究的同时,为了避免遗漏大学生认知层面的质性研究数据,邀请了三名高校教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电话访谈,对访谈对象样本的选取设置了如下要求:①愿意接受电话访谈并且允许录

音;②兼顾不同类型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样本;③性别比率较为均衡。最终,选择了 11 名受访对象,人均访谈时长为 11.2 分钟,受访者资料如表 2 所示,访谈提纲如表 3 所示。

表 2 受访人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所学专业
A ₀₁	女	23	本科	药学
A ₀₂	男	22	本科	临床医学
A ₀₃	女	22	本科	医学信息技术
A ₀₄	女	21	本科	医学检验
A ₀₅	男	19	本科	网络与新媒体
A ₀₆	男	19	本科	播音与主持艺术
A ₀₇	女	20	本科	广告学
A ₀₈	女	24	硕士	传播学
A ₀₉	女	25	硕士	艺术学理论
A ₁₀	男	20	本科	机械电子工程
A ₁₁	男	20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①刘大志通过编制量表对网民个体公共讨论理性程度进行了测度,并获得了网民个体公共讨论理性程度这一概念的结构维度。

表3 访谈提纲

访谈主题	访谈内容
信息获取	疫情信息的获取渠道主要来自哪里;您对这些渠道的信息源信任程度如何;您为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信源所提供的信息
认知态度	如果有疫情的热点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您会接龙吗;您的态度是接受、认同大家的观点还是理智思考后冷静、客观地表达个人观点,理由是什么
言论行为	您是否经常转发关于疫情的相关信息,您是否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有关疫情的个人观点,如果是,主要在哪些社交媒体平台转发或表达,理由是什么
基本信息	性别、年龄、学历、所学专业、现居住城市

三、实证分析

(一) 样本情况描述以及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2020年2月,在疫情暴发严重之时,研究人员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通过网络调研平台问卷星发放问卷,主要考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期间大学生网络言论的理性程度,以及情绪、民族、政治面貌、性别、所学专业等因素对大学生网络言论带来的影响。问卷的选择题主要询问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量表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计分法,使用本文设定的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量表测量大学生网络言论的理性程度。共收回问卷1721份,使用SPSS19.0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剔除非学生身份、填写问卷时间低于60秒以及规律性填写的问卷后,得到1566份有效问卷,

有效率为90.99%。问卷星后台的IP地理位置分析显示,问卷填写者来自广西、江西、北京、广东、湖南、甘肃、湖北、江苏、内蒙古、新疆等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有效样本的检验显示,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09,其标准化后的Alpha系数为0.743,问卷信度较高。量表的KMO值为0.797,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量表具有结构效度,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 数据统计与分析

1. 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测量。量表题项有“完全同意”“基本同意”“有些同意”“不怎么同意”“完全不同意”五种回答,正向计分题项对应计为1、2、3、4、5分,反向计分题项对应计为5、4、3、2、1分,量表得分值越低表明大学生网络理性程度越高。如表4所示, X_{11} 的三项指标均值均小于1.5,且中值及众数均为1,说明面对重大疫情中不同渠道的网络信息,大部分大学生懂得要进行网络信息甄别。 X_{121} 、 X_{122} 两项指标均值均超过了2.5,且中值及众数均为3,说明面对重大疫情,网络上的群体压力对大学生有一定的影响。 X_{22} 的三项指标均值近似等于1.5,且中位数及众数均为1,说明面对重大疫情,大学生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论行为,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此次测量得到的所有题项计分的均值都低于3,并且10个题项中有7个题项得分均值低于2。综上所述,面对重大疫情,大学生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较高。

表4 理性程度量表的描述性统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题项	均值	中值	众数	标准差
认知 X_1	网络信息甄别 (X_{11})	X_{111}	1.41	1	1	0.730
		X_{112}	1.38	1	1	0.686
		X_{113}	1.46	1	1	0.810
	坚持独立思考 (X_{12})	X_{121}	2.78	3	3	1.029
		X_{122}	2.84	3	3	0.947
		X_{123}	1.69	1	1	0.964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题项	均值	中值	众数	标准差
行为 X_2	盲目质疑政府	X_{211}	2.24	2	2	0.988
	(X_{21})	X_{221}	1.49	1	1	0.779
	保持谨慎言论	X_{222}	1.57	1	1	0.769
	(X_{22})	X_{223}	1.49	1	1	0.734

2. 量表数据的降维。为便于进一步的统计与分析,用因子分析对大学生理性程度量表中的 10 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如表 5 所示,从 10 个题项中提取 3 个因子,3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 65.127%,能较好地降维并代表原始数据。再依据表 6 将提取的三个因子分别定义为行为因子、

网络信息甄别因子和独立思考因子,计算各因子的因子得分 $S_{F_1}, S_{F_2}, S_{F_3}$,依据各因子的权重和因子累计贡献率计算出单个大学生样本个体的理性程度综合得分 $Score$:

$$Score = \frac{(0.235S_{F_1} + 0.224S_{F_2} + 0.193S_{F_3})}{0.651} \quad (1)$$

表 5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合计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合计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1	3.478	34.777	34.777	3.478	34.777	34.777	2.345	23.445	23.445
2	1.927	19.271	54.048	1.927	19.271	54.048	2.242	22.418	45.863
3	1.108	11.080	65.127	1.108	11.080	65.127	1.926	19.264	65.127

表 6 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X_{111}	0.257	0.806	0.076
X_{112}	0.271	0.828	0.050
X_{113}	0.081	0.784	0.000
X_{121}	-0.015	0.004	0.788
X_{122}	-0.104	-0.032	0.820
X_{123}	0.145	0.139	0.706
X_{211}	0.641	-0.065	-0.314
X_{221}	0.743	0.236	0.099
X_{222}	0.794	0.269	0.060
X_{223}	0.757	0.373	0.125

3.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将政治面貌作为定序变量,对大学生的政治面貌与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综合得分 $Score$ 值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具有相关关系($r=0.068, p<0.05$)。将政治面貌作为自变量,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 $Score$ 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的排序为:中共党员 > 共青团员 > 群众($\beta=0.104, p<0.05$)。

对大学生的情绪状态与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综合得分 $Score$ 值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r=0.196, p<0.001$)。将大学生情绪作为自变量,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 $Score$ 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情绪越积极乐观,大学生网络言论越理性($\beta=0.269, p<0.001$)。

4. 方差分析。在通过样本的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之后,将因子分析中得出的大学生样本理性程度综合得分 $Score$ 值作为方差分析的观测变量,大学生就读学校或者居住地是否在湖北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就读学校或者居住地是否在湖北对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有显著性影响($p<0.005$),不在湖北地区就读或居住的大学生的网络言论更有理性。这说明大学生所在地的疫情严重程度会显著影响其

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将大学生情绪作为定序的观测变量,大学生所在地是否为湖北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大学生所在地是否为湖北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不显著($p > 0.05$),这说明当地疫情程度不是影响大学生情绪状态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探究大学生所在地疫情严重程度是否可以通过影响大学生的情绪从而影响

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将大学生所在地是否为湖北作为自变量,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作为因变量,大学生情绪状态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作用的检验,发现中介效应不显著。大学生所在地疫情程度、大学生情绪状态、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三者之间回归分析或方差分析检验的 p 值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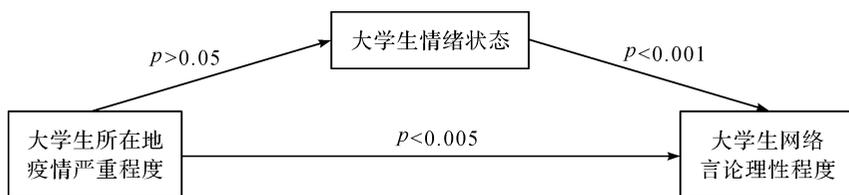


图 1 检验结果

为了探究是否为医学类相关专业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的影响,在通过样本的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之后,将大学生样本理性程度作为方差分析的观测变量,大学生是否为医学类相关专业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是否为医学相关专业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具有显著影响($p < 0.05$)。依据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三因子得分 S_{F_1} , S_{F_2} , S_{F_3} 和综合得分 $Score$ 的差异直方图发现,医学类专业学生除了行为因子数值较高外,网络信息甄别因子、独立思考因子以及网络言论理性程度的数值均明显偏低,这说明面对重大疫情,医学类专业学生网络言论理性明显高于非医学类专业学生。由于了解传染疾病的相关医学常识,医学类学生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要强于非医学类专业学生。

在通过样本的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之后,将因子分析中得出的大学生样本理性程度综合得分 $Score$ 值作为方差分析的观测变量,性别、民族、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分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p 值均大于 0.05,说明性别、民族、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

产生的影响不显著。

四、探讨与对策

(一) 网络言论的双面表现:日常娱乐调侃与关键时刻谨慎约束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较高。如表 4 所示,大学生的言论行为理性程度略高于言论认知理性程度。通过定性访谈也发现,部分大学生虽然在认知上不够理性,但在特殊时期并不会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发表不理性言论。虽然大学生较少转发疫情信息、直接发表个人观点,但在定性访谈中发现,大学生会用抖音热门视频点赞、微博点赞等方式来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具有强连接的亲人、朋友关系的封闭社群等小范围内谈论疫情、转发疫情信息。访谈发现,在特殊时期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约束大学生网络言论的因素有理性的爱国热情、对政府的信任,有对发布不当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公安机关处罚的担心,“以大局为重”的道德观念和“万众一心”的

传统文化认同也是大学生约束自我言论的原因。

一些文献通过对社交媒体上的文本信息分析发现,大学生乐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调侃,甚至发表一些看似冲动的言论。在访谈中,有受访大学生认为,在关键时刻网络舆论场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而并不是日常消遣娱乐的“情绪释放场”“互动游乐场”。这种日常娱乐与战时谨慎的双面言论也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以及自我约束能力并不低的现实。此外,要注意大学生网络语言所蕴含的深层情绪。大学生的网络语言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情绪基因,如“吃不起茶叶蛋”“青岛大虾”的说法是用娱乐、调侃的语气来达到针砭时弊的实际目的^[22]。对大学生的网络言论要进行积极引导,不断地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在特殊时期也要允许大学生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理性的个人情感,使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公共意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二) 不可忽视的网上群体压力:意见领袖队伍的构成与特质

群体压力是影响网民参与集群的重要因素^[23],网络集群制造的亢奋氛围可能会使成员失去理性的自控能力,出现对群体意见支持或反对的简单化站队行为。量表 X₁₂₁、X₁₂₂ 两个题项的中值及众数均为 3,这说明面对重大疫情,网络上的群体压力会影响大学生。通过频数统计发现:有 58.5% 的大学生会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内容、微博热搜来了解疫情信息,有 98.6% 的高校大学生会关注学校、班级社群发布的疫情信息及生活、学习提示。回归分析发现,中共党员的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质优良、言论理性程度较高、社会责任心较强。访谈也发现,在危机时刻,大学生党员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能够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在危机时刻,中共党员不仅在线下以身示范,在线上

也有担当和作为,对西方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毒源论”“中国无人权论”和“索赔中国论”等不实言论敢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且善于发声,是最值得信赖、最有责任感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

频数分析发现,虽然大学生的信息来源较为多元,但主要信赖的信源为官方权威媒体。有 92.6% 的高校大学生主要通过官方权威新媒体平台了解疫情的相关信息。在访谈中也发现,大学生对权威媒体和医疗卫生领域头部意见领袖发布的疫情信息信赖度较高。当突发事件以碎片化的形态在网络上呈现时,感性判断得以较大程度地被调动激活,网民的情绪和情感更容易被唤起^[24],权威媒体、医疗卫生领域的垂直头部账号在此次疫情暴发期间发布的信息及时、全面、客观,其“逆火效应”并不明显,大学生对部分市场化运作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零散、片面或带有主观情绪的信息持有质疑态度。政府除了要通过官方权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疫情信息,还要增强信息被接受、认同的能力^[25],努力建立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共同体”:一方面,强化官方权威媒体的宣传与监督功能,准确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及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与普及率、使用率高度的社交媒体合作,开辟具有求证与信息反馈功能的平台;同时,要引导、联合医疗卫生垂直领域中头部的专业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有理有据的科学疫情防控信息。除此之外,还要加大对自媒体平台特别是一些营销号的监管力度,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本次研究发现,医学及其相关专业学生对新冠肺炎认知程度较高,认识较为全面,防御积极,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也较为信赖医学类学生的网络言论。政府以及教育部门要重视医学类专业学生的网络言论引导,充分发挥医学生网络言论“专业+理性+可信”的优势。

通过方差分析发现,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的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影响不显著,表明学生干部的理性思考水平和政治觉悟有待进一步

提高。教育部门应积极发挥学生干部的骨干作用,鼓励学生干部主动参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指挥的抗疫工作。学生干部在理解和参与重要社会事件中会对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有更深刻的现实体会^[26],学生干部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政治责任感在实践中会得到强化,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焦虑情绪:产生原因与排解路径

频数分析发现,面对重大疫情,大学生情绪状态整体较为稳定,其中情绪积极乐观的占比47.1%,悲观恐慌的仅占比3.6%。如前所述,大学生的情绪状态会极为显著地影响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故缓解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是进行网络言论引导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数据还显示,大学生所在地的疫情暴发严重程度并不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情绪状态。访谈也发现,很多大学生的焦虑心理与情绪不稳定状态并非来源于“疫情恐慌”的直接影响,而是因为大学生长时间停课隔离在家,学习、生活规律以及社交习惯发生了改变,导致心理上出现易怒、烦躁等情绪波动反应,进而在社交媒体上间歇性发表非理性言论。这些言论内容与新冠疫情的信息困扰、健康担忧无直接关联,属于学业担忧、社会责任感知、社会支持感知、家庭关系困惑和人生思考等其他维度内容^[27]。因此,首先,政府及教育部门要想办法疏导大学生的心理情绪,开通网络心理咨询服务;其次,教育部门以及相关机构应该与网课平台以及视频类社交媒体合作开设年轻人感兴趣的网络课程,在疫情期间培养大学生多元的兴趣与爱好,对大学生关注的与自己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信息,如开学日期的变更、网络教学的方式、学生票改退签规定的变化进行及时回应;再次,家庭成员之间也要互相理解,有效沟通,社区要组织有经验的调解员调解疫情期间的家庭矛盾;最后,媒体要考虑受众多维度的内心状态

进行议题设置,提升大学生对正面舆论信息的关注度,激发大学生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五、余论与研究展望

研究还发现,医学类专业学生参与疫情中热点事件的网络刷屏频数远高于非医学类学生。医学类的学生在参与刷屏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人设建构”和“镜像效应”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分享来强化医生职业形象的议程设置,消减部分公众对医生的偏见;另一方面,转发行为包含了树立高尚职业道德观念的愿望,对职业信仰也更加坚定。医学生的这种网络行为是自我意识在媒介上的感觉延伸,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新途径。情绪释放也是大学生参与刷屏互动的主要动机。当人的生活状态、社交习惯发生改变时,会不由自主地出现情绪波动,此时的热点事件恰好成为大学生情绪集中宣泄的出口,这种情绪释放不能简单地归因为话题的热度以及敏感度。此外,在重大疫情的不同阶段,网络言论的焦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严防严控”到“复工复产”到“境外输入”再到“全球疫情”,大学生关注的焦点在不断发生变化。新冠肺炎舆情热度以及焦点的变化是舆情参与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权威官方媒体要及时调整议程设置内容,适时满足民众对不同焦点议题的知情权。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虽然大学生情绪、政治面貌会影响其网络言论理性程度,但是情绪变量、政治面貌变量与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值较低,说明面对重大疫情,大学生网络言论理性程度可能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待发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网络中的认知与行为理性如何更好地传递至现实社会,促进线上言语理性转化为线下理性行动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孙聪, 刘海霞, 范思语,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公众认知、态度和应激反应调查[J]. 中国医院统计, 2021(3): 259-263.
- [2] 周高琴. 突发事件中恐慌性谣言网络传播的影响因素及治理启示——基于 2015—2019 年间 15 起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J]. 电子政务, 2021(8): 94-104.
- [3] 靖小琴, 刘巧玲. 论网络言论理性表达引导[J]. 湖北社会科学, 2014(2): 185-188.
- [4] MIYABE M, NADAMOTO A, ARAMAKI E. How do rumors spread during a cri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b Information Systems, 2014(4): 394-412.
- [5] 丁学君, 樊荣, 杨锦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及评述[J]. 电子政务, 2017(6): 47-56.
- [6] 李纲, 陈璟浩.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综述[J]. 图书情报知识, 2014(2): 111-119.
- [7] 方付建. 把脉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研究[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176.
- [8] 张志安, 晏齐宏. 个体情绪 社会情感 集体意志——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及其因素研究[J]. 新闻记者, 2016(11): 16-22.
- [9] 胡泳. 众声喧哗: 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84.
- [10] 刘大志, 郁建兴. 网络理性何以可能? ——对“超大”论坛的案例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4): 34-40.
- [11] 张天民, 艾晋, 韩沛锷. 风险社会治理下网络理性参与机制构建[J]. 现代管理科学, 2017(2): 64-66.
- [12] MAYER J D. Mood-congruent memory and natural mood: new evidence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5(21): 736-746.
- [13] 刘宏艳, 胡治国, 彭聘龄. 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4): 714-721.
- [14] 胡百精, 杨奕. 欲望与认同: 二十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基于特洛特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重述与讨论[J]. 国际新闻界, 2017(10): 55-76.
- [15] HOU J. Structure Reversal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for the Heterogeneous Health Concerns under NIMBY Conflict Environmental Mass Events in China [J]. Healthcare, 2020(3): 324.
- [16] 熊炎. 解释警示逆火效应是醍醐灌顶还是火上浇油?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1): 59-77.
- [17] 熊炎. 谣言传播逆火效应的成因解释与抑制策略——基于实证研究的整合与推导[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41(1): 75-81.
- [18] 卜建华.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功能与影响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 [19] PAPACHARISSI Z. Democracy online: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s [J]. New Media Society, 2004(2): 279-281.
- [20] 彭兰. 社会化媒体: 理论与实践解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46.
- [21] 刘大志. 网络理性的生成及影响[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3.
- [22] 隋岩, 李燕. 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J]. 国际新闻界, 2020(1): 79-98.
- [23] 吴鹏, 王夏婷, 金贝贝. 基于 BDI-Agent 模型的网民集群行为建模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4): 136-144.
- [24] 邓若伊, 郭佳. 网络舆论萌芽阶段的特征及规律分析[J]. 新闻界, 2015(17): 49-52.
- [25] 祝哲, 彭宗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厘定: 挑战和对策[J]. 东南学术, 2020(2): 11-17.
- [26] 张依. 青年网络舆论监督的本质、逻辑和发展路径——重大疫情下的舆情反思[J]. 北京青年研究, 2020(3): 64-69.
- [27] 吕楠楠, 张敏.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状态的结构及其测量[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4): 354-361.

(责任编辑: 丁小文)